

# 我国医药学的 起源与发展

ZHONG GUO  
WEN HUA SHI  
ZHI SHI  
CONG SHU

## 1 古代医药保健活动的起源

# 我

国医药保健活动起源古远。以历史发展的规律来分析，毋庸置疑，医药学也像其他文化科学一样，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劳动实践密切相关。劳动创造了人类，劳动使人类创造了自己的一切文明，那么藉以延长自身生命活动的医药学，也必然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、发展和传播的。

由于文字的产生远远晚于人类医药卫生保健活动的产生，所以不可能有历史上当时的文献资料证实医药保健活动起源于何时。我们仅能就战国以来幸存的文献及有关医药起源的传说，进行历史的、客观的、科学的分析，作出结论。而这些分析也不断地被近代陆续发掘、出土的远古时代人的遗迹和实物所证实。

古代文献记载的医药起源，多集中在炎帝

( 神农氏 ) 太皞 ( 伏羲氏 ) 黄帝 ( 轩辕氏 ) 时代。那不过是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，距今仅四五千年。可是我们知道医药保健活动是在劳动实践中逐渐丰富的。人类为了生存，与大自然斗争，由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，其间的很多活动都与卫生保健有关，进而由无意识的自身防护发展为有意识的医疗活动，这一过程是可以上溯至数十万年以前的。

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距今 69 万年前原始人类的遗址 有几处山洞中存留着一些灰烬。最厚的一处达六米，灰烬中有许多被火烧过的兽骨。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能掌握和使用天然火了 而且经常用火烤食兽肉。由于熟食可以缩短消化食物的过程 而且火能御寒、照明、驱散山洞中的潮湿 改善了居住条件 自然也就减少了疾病 增强了体质。火的使用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解放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，人类利用火也成为卫生保健活动的重要进步。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 人类又发现火可以祛除病痛 逐渐有了利用‘灸焫〔ruò 若〕’方法治疗疾病的经验。这就是现在艾灸疗法的来源。

古人类最早用来抵御猛兽、猎食为生的工

具就是石块。在与 80 万年以前蓝田人化石相同的地层发现有大三棱形尖状石器，而北京人制造的石器更有着明显的进步，他们所用的石料是经过选择的，打制得也更为规整，而且有刮削、砍砸、割刺等适用于不同目的的石器。针刺疗法最早的器具——砭〔biān 边〕石即由此产生。《山海经》<sup>①</sup>记载：“高氏之山 其上多玉 其下多箴石。”箴石就是在战国以前发现的古代医用针具。箴就是针，箴字从竹，也表示针具的发展曾有竹制阶段。至目前大量出土的古代文物中，有石针、骨针、陶针等。证实用作治疗疾病的针术，在石器时代已具雏形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针具与针术也在不断地进步，直至冶炼术发明后形成金属针具。《灵枢经》记载有“九针”，就是有九种不同形状、不同用途的针具，可以针刺、割治、放血、排放积水积脓等，用途非常广泛。说明至晚在战国时期针术治疗方法已是多种多样，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如果生产力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平，这个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《山海经》记述各地山川、道里、部族、物产、祭祀、医巫、原始风俗，保存远古神话传说和史地文献非常丰富。原称夏禹、伯益所著，据考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，秦汉有所增删。

从现存的医籍和有关文献分析，针灸著作出现得最早，内容也最为成熟，上古时代治疗疾病往往先考虑用针灸术。可能针术、灸术是我国最早形成的治病方法。而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建立在古代人劳动实践基础上的。

酒的出现也很古远。《说文》解释“醫(医)”说：“治病工也。……醫之性，然得酒而使。从酉。”酒的古文作酉，从“醫”字看，说明医与酒是有联系的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中有关于醪醴制作和医用的讨论。醪醴，就是汁滓酒。

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，原因是当时他们改造环境的能力很差。北京人住在龙骨山的天然洞穴中。据考证有一个时期，曾被鬣[liè 猎]狗占据了洞穴；还曾因大水淹没而暂时迁居，由于洞顶不断地塌落，只好又在洞内寻找另外可住的部分。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他们的寿命很短。通过对发掘出来的 22 名猿人遗骨化石进行研究，50 至 60 岁只有一人；14 岁以下有 15 人。在后来漫长的生活中，人们逐渐认识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危害；认识到寒冷、潮湿、炎热、风雨以及虫兽的侵扰，都可以使人发生病痛。由于劳动经验的积累，创造能力逐步提

高，他们不再安于适应自然环境了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环境。因此有了衣服和居所的发明，并不断地改善。由裸身生活，进而用树皮、兽皮御寒，到发明缝制及原始的纺织劳动，创造出唯人独有的衣服；由洞居生活，进而构木为巢栖身树上，到土窖、地窖，发展为木屋、石屋。都表明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人们生活条件在逐步改善。而这些与大自然抗争的每一次进步，其实都是以卫生保健、防御疾病为目的的。在这一系列目的明确的劳动实践过程中，人们也就逐步认识了致病因素与防病方法。

类似的保健方法还有原始的舞蹈。原始人由于工具粗糙，狩猎能有收获是很不容易的。因此当他们获得较大的猎物时，其高兴的情态可想而知。每当此时，他们便模仿动物跳跃、飞翔的欢快动作以表达胜利的喜悦，原始的舞蹈也就产生了。舞后自然身体暖和，精神欢愉，自然而然，也就把它作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了。很久以后，人们从中发现类似的运动可以强健筋骨，就把它作为健身防病的一种方法。导引术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导引术是古代一种体育锻炼形式，就像现在的健身体操加入呼吸调节。古代的舞

蹈和导引都常常模仿动物的姿态，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。



《导引图》（局部复原）

古代医药知识的积累也是与人类的生产、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。采集野果是远古时代人类生活来源之一。从盲目地采集，到有选择地采集和食用，这一过程就说明人们已经对一些有毒性的植物有了感性经验，并代代相传。哪些植

物可以致泻；哪些植物可以致吐；又有哪些植物误食后会昏睡，或者汗出不止等等，这些认识就奠定了药物治疗的基础。随后人类由采集野果到发明农业；由狩猎发展为渔牧业；而金属冶炼时代的到来，又使人们积累了矿石性能知识。于是植物、动物、矿物的一些偏性、毒性被人们逐渐认识，这实际上就是药理学知识。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加深，这些吐、泻、汗、睡等偏性也被用于治疗疾病。所以说医药学也是来源于劳动实践的。

从以上灸、针、导引、医药等起源的分析中，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：古代医药卫生知识，是各地的劳动群体在生产、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、互相交流的，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发明。所以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说：“砭石者，亦从东方来”；“毒药者，亦从西方来”；“灸焫者，亦从北方来”；“九针者，亦从南方来”；“导引、按蹠（按摩）者，亦从中央出也”。

医药学并不是某个人的发明，但在医药学发生、发展、传播过程中，某些人曾在某些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，人们也会世代地纪念着他们。在古代文献中保留着一些某人发明医药

的传说，其中就是基于这种原因。但其方式不过是用首领的称谓如神农、伏羲、黄帝等来纪念着部族群体的荣誉罢了。

## 2 中医学发展梗概

我国医药学的发展，也像其他学科一样，与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虽然它在不断地进步，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。这要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——夏王朝说起。

夏、商两代是我国奴隶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时代，在农业、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有着突出的成就。特别是起于夏末、盛于商周的青铜文化，以及殷商业已成熟的甲骨文字，标志着我国高度的古代文明。自然在医药方面也会有一些进步。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，发现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明确的分类，所涉及的范围已包括今天的内、妇、儿、外、五官等科疾病，疾病名称有 20 多种。有些病名的发明在医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。如对龋齿的记载就是有关该病的世界最早记录。当时有“疾年”的说法，指多病之年，

是有关流行病的最早记录。在治疗疾病的药物和方法上，也有一些经验积累。但夏、商医药学发展比较缓慢，与生产、文化的突出成就极不相称。其直接原因是夏、商时代的医疗活动是控制在巫师手中的。巫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，至商已成鼎盛之势。他们被认为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，可以参与包括国家大事在内的一切社会事务，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。在万事求助于巫的时代，巫、医一体的“巫医”自然也应运而生。巫医之所以能取信于人，是因为他们在巫术的掩饰下也施行医药治疗。《山海经》就有关于巫师们常采药于灵山及“操不死之药”的记载。可见巫医之所以“能祝延人之福，愈人之病”并非不倚重药物。因此在巫医一体的时代，就形成了医药为巫服务，而巫师控制了医药的可悲局面。故夏、商两代，医药学仍戴着沉重的神权枷锁，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，致使医学理论的产生推迟了很长时间。

西周至春秋时期，奴隶制度从兴盛走向衰落，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陆续完成了封建制的过渡。至秦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。周初由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，社会分工更趋

于专业化。《周礼》所设的政府机构已将巫师与医师的职责明确分开：医师（医官）隶属于天官冢宰；巫师隶属于春官宗伯。“医师掌医之政令，聚毒药以共（供）医事。”司巫掌群巫之政令。若国大旱，则率巫而舞雩（yú 于）；国有大灾，则率巫而造……’表明当时医、巫分职，已经有了法定的医政组织。周代的一些书籍中一些有关记载，反映了医药学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如《周礼》记载了医学分科、粗略的诊察疾病和内治、外治的一般原则；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等记载了很多药物知识；“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”六气致病说<sup>②</sup>的出现，强调了医学本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，为战国至秦、汉时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，奠定了基础。虽然如此，由于巫医的影响由来已久，社会上仍存在着对“信巫”还是“信医”的抉择。为此医家对巫术展开的坚决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。如《内经》强调：“拘于鬼

《周礼》所载天官冢宰所辖相当于后世吏部；春官宗伯所辖相当于后世礼部。

<sup>②</sup> 据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，秦国医和诊视晋平公蛊疾，论及“六气致病”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分为四时，序为五节，过则为灾。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，风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

神者，不可与言至德（指医学理论）。”并告诫：“妄作杂术 谬言为道”是医生的过失。而医生最有力的批判武器，就是巫术不可能产生的医疗效果。《史记》中载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东周时虢〔guó 国〕国太子病危，国中为“治禳”（祈祷活动）停止一切活动，但无济于事，还是赖秦越人高超的医术而得救。司马迁追述这段史实后，曾总结病有“六不治”，“信巫不信医”是其中之一。医、巫分业使医学发展进入科学轨道，医对巫的斗争保证了医学的健康发展。

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简帛医书，共 14 种，三万多字。书中对有关经络、脉法、医方、养生、胎产等知识 无不涉及。据考证，这些医书为春秋至秦、汉之际各时期著作。其中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和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，是迄今发现的有关经络的最早文献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汉初尚能见到先秦的医著中医经有七家，计 216 卷。然而后世仅存《黄帝内经》一家，18 卷。这就是至今仍被奉为医宗正典的《灵枢》和《素问》各九卷。《黄帝内经》证明我国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。两千多年来，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尽管在不断地充实

和发展 但皆未离《内经》其宗。《内经》全面地论述了人的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则、治法及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中医的阴阳、五行、脏腑、经络、病因、病机等理论，皆宗于这些医学经典。它反映了中医学整体的、宏观的学术特点，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依据。《黄帝内经》有很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，所以它既不可能是孤立产生的，也不可能是历史上第一部医学理论专著。《内经》中引用了很多古代医学文献，其中明确书名的就有 20 余种。这是失传的先秦医籍的重要线索。关于《内经》的成书年代 历代学者分歧很大 较为客观的意见是，《内经》约问世于战国时期 其后在不断传抄过程中，经秦、汉医家综合、充实而成。

现存的另一部很有影响的医学典籍是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简称《难经》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称此书为秦越人所撰。但历来大多数学者经考证反对这一说法。从张仲景著《伤寒杂病论》曾参考该书，说明至迟在东汉时《难经》已流行于世。从其内容看 明显是以《内经》的理论为基础，在某些方面，尤其是命门、三焦、奇经等问题，有更深入的探讨，显然该书是著述于《黄帝内经》之后，但也不会晚于两汉。

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理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像《内经》一样并非出自一时、一人之手笔，大约是秦、汉以来许多医家的经验结晶，最后成书于东汉。它总结了先秦、两汉的药理学成就，以后历代的本草著作都是在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基础上扩充而来。

东汉时最重要的医学成就是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问世。他在以往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，创造了以“六经辨证”论治伤寒病（外感热病体系）以“脏腑辨证”论治杂病的诊疗思想模式，形成了理、法、方、药密切联贯的辨证论治体系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是历代医家必须研读的医学典籍。此外，东汉的另一位名医华佗的麻醉术和剖腹手术，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，对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魏、晋至唐，医学有了全面的发展，对临床医学尤为重视。晋代针灸学与脉学的发展较为突出。王叔和搜集了前代医家的有关诊脉方法的阐述，结合个人临证经验，著成《脉经》10卷，把脉象归纳为24种，明确了切脉诊病的方法，使后世脉学研究有所依据。皇甫谧〔mì 密〕所著的《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》（简称《甲乙经》）为

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。由于该书以切合实用、便于掌握为宗旨，故对普及和发展针灸学做出了贡献。《甲乙经》后来还传到国外，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隋朝医家很重视对病因、证候学的研究。巢元方等人所著的《诸病源候论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全书论述了 1700 余种病候，成为后世病名研究的模式。如妇产科疾病，就分为妇人杂病、妊娠病、将产病、难产病、产后病五类，几乎包括了现在中医妇科的所有病症。对流行性传染病、寄生虫病，甚至某些过敏性疾病，都有一定的认识。对消渴（糖尿病）、脚气病、麻风病等，描述已经非常详细，为世界前列。该书的内容还反映出当时已经能做人工流产（妊娠欲去胎候）、肠吻合（金疮断肠候）、拔牙（拔齿损脉候）等手术。其中肠吻合手术的方法、要点、步骤及术后护理，介绍得详细、合理，与史书粗略记载的华佗治法一致，弥补了华佗手术治法失传的部分缺憾。

自东汉以降，方书盛行，很多医家都留下了宝贵的医疗用药经验，学术影响泽于后世。晋代葛洪所著的《肘后救卒方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它不但切合实用，而且有些内容属世界首创。如有关恙虫病、天花病的描述，用狂犬脑防治狂犬病等，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南北朝时曾问世两部很重要的方书，即陈延之的《小品方》和姚僧垣一作僧垣的《集验方》。唐代曾将《小品方》列为医生必读之书。可惜二书北宋时即已失传而唐宋间认为：“古之如张仲景、《集验》、《小品方》最为名家。”唐代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、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两部巨著，是集东汉以来临床验方之大成的代表作，标志着唐以前临床医学较高的学术水平。

宋代由于朝廷重视医学，设置了校正医书局，加之文士习医成为风尚，以及活版印刷术的发明，给古医籍的校订、刊行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，所以对古医籍的整理最有成就，很多古代医籍赖此得以流传后世。当时的方书、本草著作也大量刊行。如最早的很有影响的妇科专著《妇人大全良方》、儿科专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、外科专著《刘涓子鬼遗方》、眼科专著《银海精微》等均问世于宋代。宋人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，历来受到国际法医学者的高度重视。宋代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医学文

献，并在临床专科治疗方面成绩突出，为金元时期医学各家学派的理论建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金元时代社会动乱，百病丛生。医者多有“古方难治今病”之感，所以从临床实际出发，对医学理论屡有创新。因见仁见智，遂有医学派别之分，其最杰出的领袖被称为“金元四大家”：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杲、朱震亨各树一帜，他们的“主火”、“攻邪”、“脾胃”、“相火”等学说，打破了宋代医学界尊经、执着的沉闷空气，推动了后世医学的发展。此外，元代骨伤科有较高的水平，这与善骑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不无关系。在李仲南的《永类钤方》和危亦林的《世医得效方》中对骨伤科疾病都有详尽的阐发，这部分内容是我国较早的，也是很有世界影响的骨伤科成就。其中麻醉术的施行有具体描述。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，属世界首创。

明代医学受金元学术影响很深，但多无门户之见，故学术空气活跃，多有建树。其佼佼者如薛己、孙一奎、张介宾、李中梓等皆是学验俱丰的大医家。他们针对金元以来用药时弊，创立了温补学派，重视人体正气、阳气的顾护。明代